

#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 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sup>\*</sup>

上海外国语大学 沈 骑 华东政法大学 夏 天

**提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正成为国际社会语言学研究新热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问题也亟待系统开展。本文在评述国内外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研究的方法,首次提出一个基于不同对象层次、多问题领域的语言规划分析框架,希冀以此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 国际学术交流、语言问题、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3)06-0876-10

## 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下,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和传播中的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热点。在各类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问题不容忽视,语言作为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载体和工具,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国外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语言规划研究方向,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相比之下,我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尚未系统开展,现有研究存在焦点单一、问题意识不突出、语言规划研究严重缺位的局限,对我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状况、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地位乃至学术语言话语权等问题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从

---

<sup>\*</sup>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安全问题与语言规划研究”(12CYY016)、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的市级项目“语言安全视域下的外语教育战略比较研究”(B12017)和2012年国家语委科研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外语能力调查与公民外语能力提升策略研究”(ZDJ125-2)的资助。《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而导致这一领域的语言问题日益突出。近十年来,在学界相关争论不绝于耳(参见阎光才 2004;党生翠 2005;王宁 2006;朱剑 2009;赵宴群 2010;陈理斌、武夷山 2011;陈明瑶 2011;桑海 2013),这些争论,从宏观到微观,从语言战略到语言规范,都涉及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各种语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一领域现实语言问题的多样性和紧迫性,以及开展相应的语言规划研究的必要性。国际学术交流语言规划研究是新时期国家外语规划的一项重要新任务,事关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大局,而学术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和关键。李宇明(2011)在论述国家语言能力规划问题时,专门提及国家外语研究能力和国家学术语种的规划问题。他还指出中国领域语言生活的学术研究亟待开展,领域语言规划在国家语言生活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宇明 2013)。为此,本文拟简要评述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探讨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研究的方法,希冀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入开展。

## 2.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概述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至少涉及语言学、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议题,也是语言竞争和传播的新领域之一(赵守辉、张东波 2012)。国外较早从语言规划角度探讨国际学术交流语言问题的学者是 Baldauf 和 Jernudd,他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始于其对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心理学学术刊物语言使用的个案调查(Baldauf & Jernudd 1983,1987)。此后,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近十五年来,成果逐渐丰富起来。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AILA)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该会会刊 *AILA Review* 2007 年在第 20 期以专刊形式发表主题为“当前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不平等现象”的 8 篇论文,集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学术交流中的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走向等热点问题。此外,语言政策研究国际期刊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和 *Language Policy* 也分别于 2006 年第 1 期和 2013 年第 3 期推出专栏,均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角度探讨非英语国家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与论文发表中的语言问题。从总体来看,国外研究视角多样,已基本形成从研究者个人和学术群体到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层次理论和实践研究体系。就语言规划的类型而言,德国语言学家 Kloss(1969)的两分法,即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和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以及 Cooper(1989)提出的语言习得规划(language acquisition planning)作为两分法的补充类型都是被广泛采纳的分类。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也主要表现为上述三个类型,下面对此做简要介绍。

## 2.1 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地位规划研究

语言地位规划是指社会通过法律或相关规定对语言角色和功能做出规定的活动(Lo Bianco 2010),例如对什么样的语言赋予什么地位,什么语言是官方语言,什么是非官方语言却是通用语言,以及在什么场合下可以使用什么语言等规划活动。语言地位规划的实质是对语言的用途或功能的分配,对语言使用的场合(如学术语种)做出规定。Baldauf & Jernudd(1987)调查了 1979-1983 年期间北欧出版发行的 6 种心理学刊物的语言使用和语言问题,研究发现,为了满足国际交流和传播的需要,特别是为了扩大国际关注度,这些刊物都面临逐步放弃本土语言转向英语发表论文的艰难抉择。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成为国际学术交流“至尊语言”这一现实,法国学者 Calvet(2006)反思在英语霸权之下,法语学术语言地位式微给法国文化和语言安全带来的威胁;德国学者 Ammon(2001,2007)一直致力于从学术交流史流变中观察学术语言地位的变迁问题,他通过对乌利希国际期刊数据库(Ulrich's Periodical Directory)调查发现,虽然英语作为国际学术语言大行其道,但德语作为重要学术语种在医学、部分工程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依旧;此外,西班牙学者 Hamel(2006)、丹麦学者 Phillipson(2010)以及意大利学者 Calaresu(2011)等分别探讨和分析了西班牙、丹麦以及意大利等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语言地位和使用上的不平等问题。

概言之,西方非英语国家学者出于语言安全、学术安全乃至文化安全等考虑,对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地位、语言霸权现象以及语言选择、语言态度与语言信仰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和学术大国,在面对英语作为国际学术语言,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困境下,我国学者,特别是语言学家,还鲜有关关注汉语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地位问题,仅有个别国际关系研究者对此问题有所警觉和思考(参见苏长和 2010,2011;桑海 2013)。

## 2.2 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本体规划研究

语言本体规划指的是对语言本身的改造,如词典的编纂、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以及书写系统的完善和规范等。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学术交流语言本体规划活动的重点是国际学术交流术语统一和规范、语体风格一致、语言表达选择(choice in language)和写作规范的比较和标准界定等具体问题,如 Ferguson *et al.* (2011)比较了英国学者和西班牙学者在学术术语和语言表达上差异,同时也揭示了国际期刊制定的语言规范和要求对于非英语国家学者的不利因素;再如,新加坡学者赵守辉、张东波(2012)认为在学术交流中,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英语的国际化,语言规划者都要面对专业术

语是直接采用英语还是翻译或另造新词/字的艰难抉择。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学者使用语言的调适和规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Lillis & Curry(2010)历时八年,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记叙了 50 位非英语国家学者(来自斯洛伐克、匈牙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为达到国际学术期刊的语言要求,在论文写作、投稿、编读往来以及论文评审后修改论文过程中的语言斟酌和文字润色的艰辛经历。

国内学者对国际学术交流语言本体规划的活动,主要是在双语辞书编纂和修订方面,除此之外的研究重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国际交流角度探讨学术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如吴玉章(2003)、李照国(2008)和屈文生(2012);另一方面,关注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论文写作和演讲语篇层面,如胡瑾、曾蕾(2007)和黄萍、赵冰(2010)。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对于非英语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而言,提升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当前主要是英语),学习和掌握国际学术语言使用规范,似乎已是提升学术国际化水平的现实选择。

### 2.3 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习得规划研究

语言习得规划,也称为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主要研究教育(中)语言规划问题。它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密切联系,Cooper(1989:35)认为语言教育是语言规划活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和焦点,他提出这一新领域是因为在语言交流和使用过程中,必然产生语言学习和传播等具体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学术交流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一直是英美国家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英语教学(ESL)传统研究领域,但是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微观语言技能教学,而语言习得规划研究则更为广泛地关注国际学术交流语言政策(包括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促进和提高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语言课程和教学政策(包括教材编写、教法探究和教师配备等),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写作指导和服务机制等问题。

首先,在政策层面,丹麦学者 Phillipson(2010)解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高等教育学术语言多样化的政策,但他经过调查发现欧洲高校(荷兰、瑞典、芬兰等国)实际上奉行的却是“惟英语”的隐性学术语言政策;意大利学者 Gazzola(2012)指出在国际科研文献计量指标体系(ISI)下,该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不少研究型高校推行的语言政策助推了英语作为学术交流语言的影响和作用。

其次,在学术团体和个人语言规划维度上,一方面,国际学术会议语言的使用也是语言习得规划的重点问题,因为国际会议是学术团体组织和进行国际学术活动的重要交流渠道,有学者(Ricento & Hornberger 1996)关注到非英语国家语言教师学术会议的语言使用问题,例如日本语言教师协会(JALT)就实行英语作为唯一会议语言的隐性语言政策,尽管该协会 95% 的会员都是日本学者。

另一方面,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语言选择也是学术团体和个人必须正视的语言规划问题。还是日本的例子,东京大学外籍教授 Coulmas(2007)对该校主办的 67 种学术刊物从 1980-2005 年发表论文的语种进行了文献计量统计,发现自然科学领域学者注重英语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倾向于使用母语撰写并发表研究成果,尽管用英语发表论文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但日本大学对于教师论著发表的语言政策并无强制规定。

最后,在语言教学与写作服务方面,Lillis 和 Curry 一直致力于从语言社会学视角考察多语背景学者(multilingual scholar)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发表英文的语言策略与语言服务研究,研究表明:学术英语能力成为非英语国家学者从事国际交流中极为重要的学术能力之一,为此,学术语言经理人或是中介服务成为一种新兴的业态,备受追捧(Lillis & Curry 2010)。此外,在教学政策研究层面,还有学者分别从学术写作实践中的地缘政治差异(Canagarajah 2002)、学术写作和发表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Pennycook 2001; Benesch 2001; Casanave & Vandrick 2003)以及为非英语国家人士提供论文语言服务规划和训练问题(Burrough-Boenisch 2008)等方面入手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上述国外研究多以质性民族志研究和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并分析为主,辅以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

在语言教育规划层面,国内研究一方面探讨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问题,如从丛、李咏燕(2003)、蔡基刚(2012)等都从“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和教学等方面提出改进策略与方法,初步界定了“学术交流英语”与现有普通英语课程与教学在课程、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师资培养上的差异,提出高校外语教育模式应当向“学术英语”转变。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从学术话语权和文化安全角度对教育领域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语言问题进行反思和批评,如谢天振(2005)和阎光才(2004)等。

综上,国际学术交流语言在教育领域的问题与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三位一体的具体问题领域。相对而言,国外研究较为成熟和全面,基本勾勒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状况,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研究,未能从国家宏观语言规划视角看待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问题,当然,这可能与国外大学体制和科研制度有一定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看,相关研究存在着微观语言教育研究与宏观话语研究相脱节的问题,缺乏系统分析框架和途径,亟待从多维度、多层面探索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 3. 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框架建构

李宇明(2008:115)认为,但凡开展一个崭新的领域语言规划研究,一要明确

和掌握这一领域语言生活和语言使用基本状况,二要确定该领域存在的语言问题及需要制定的语言政策,三是研究提升该领域语言能力和素质的措施和标准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系统开展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可以结合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相关理论,以语言规划的三个维度(语言本体规划、语言地位规划与语言习得规划)为规划基础,确定国际学术交流领域五个对象层次和十个具体语言问题领域,初步构建出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简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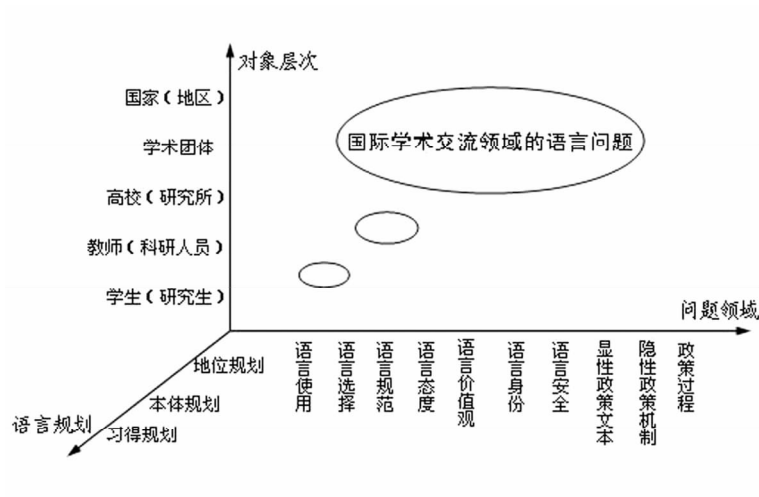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框架

### 3.1 中国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对象层次

传统的语言规划观都将国家和政府作为规划主体,现代语言规划观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全过程来看,是多层面的、有多方参与的规划活动,尤其是具体微观语言规划领域更是如此,犹如洋葱切面(Ricento & Hornberger 1996),需抽丝剥茧式地分层审视。从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看,语言规划从宏观到微观,从学术共同体到个人,至少涉及以下五个不同的对象层次:

(1) 国家层面。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地区,旨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语言政策与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学术在借鉴中创新,当前正面临从单向输入为主,向国际双向互动转变的新局面,亟需研究相关的语言战略问题,需要研究外语学科对于中国学术国际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束定芳 2013;王宁 2013)。

(2) 学术团体层面。包括国内外学术期刊、专业协会、学术组织、学术出版社以及学术中介公司等实体机构,这些团体的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到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选择和语言规范等具体问题。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群体正在研究国际化

战略,这里的语言问题将直接决定其国际化的程度和效果。

(3) 高校科研机构层面。包括各种类型的高校(如综合类、外语类、师范类、理工类、文史类)和各类科研院所。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的学科领域可能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执行不同的语言政策。

(4) 教师(研究者)层面。每一个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教师以及科研工作者都是相关语言政策的真正执行者和贯彻者,不同学科和专业教师的语言信仰和语言态度推动着学术共同体语言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外语教师在这一层面的角色尤为关键,因为他们还是语言政策制定的催化剂(Ricento & Hornberger 1996)。外语教师的教学和研究都会对语言政策实施和调适产生重要作用。

(5) 学生层面。包括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包括部分创新能力超群的本科生,也是语言规划的主要对象和执行者。广大学生也迫切需要培养并形成学术语言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通晓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规范,积极投入到国际交流的语言实践中去,从而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各类卓越研究型人才,这也是摆在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语言教育规划新课题。

### 3.2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问题领域

以色列语言学家 Spolsky(2004)提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主要内容,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以及语言管理。这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基本涵盖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主要问题领域,每一个领域又可细分为若干个次领域:

(1) 语言实践。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不同对象层次的具体语言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语言使用、语言选择、语言规范等三个实际语言行为问题。例如在我国境内召开的各类国际学术会议语言使用状况、我国人文社科学者发表论文的语言选择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语用规范等问题都是值得调查研究的新问题。

(2) 语言信仰。主要包括在该领域中学术群体和个人的语言信仰或是语言意识形态,涉及不同对象的语言态度、语言身份、语言价值观、语言安全等与语言社会心理有关的重要问题。例如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如何处理语言态度和语言身份适应问题,如何树立和调整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如何维护学术语言安全等问题,都需要开展语言信仰的语言社会学调查。

(3) 语言管理。不同对象层次都会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过程中,对自我或是群体实施语言管理来规范和治理相关语言行为,这里就有体现显性语言政策的政府文本或是法规、实际语境和相关话语体现出的隐性政策机制、相关语言规划提出和实施的政策驱动因素和动机分析以及语言管理的实际制定过程等四个问题领域。

### 3.3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

基于上述对象层次和问题领域语言问题的调查和分析,语言规划的主要任

务就是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改进建议,探索提升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机制。首先,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地位规划将对国际学术交流的语种规划、学科语言规划、出版和发表语言规划、学术会议语言规划等提出解决方案。其中国际学术交流的语种规划问题就是一个重要议题,学术语言的国际化是否就意味着“英语化”?这就要考虑学术语言多语化问题,除了英语,还有哪些关键语言是学术语种规划需关注的?这些都需引起规划者重视。

其次,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本体规划主要应对学术术语规划、学术语言标准化、现代化与信息化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这里就需要研究学术和科技术语的译入和译出规范和标准问题,这一问题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到语言标准化和信息化等语言技术领域。

最后,国际学术交流语言习得规划包括国际学术交流语言课程政策、教学政策、教师培养规划、教材规划、资源规划以及语言服务规划等实际问题探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语言教育规划研究体系。2013年初,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其核心就是以“学术英语”作为改革的突破点,目前全市已有26所高校投入到这一改革之中。同时,上海还应开展多语种学术研究语言课程规划和设置工作。从2013年上半年我们对上海各高校学术研究语种课程的调查结果看,除英语等通用外语外,仅有拉丁语、梵语和古希腊语等研究语种在个别高校开设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高校外语研究能力的匮乏,这一局面亟待改变。当然,任何一项语言规划过程往往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建立一个动态跟踪机制,形成一个长效管理和研究模式。

#### 4. 结语

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是中国学术走出去,融入中外文化交流和合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语言规划研究学科拓展、研究方法和范式突破的一个新领域,是中国领域语言规划和领域语言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本文在对这一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一个基于不同对象层次、多问题领域的语言规划分析框架,希望能够弥补国内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 参考文献

- Ammon, U. 2001. *The Dominance of English as a Language of Science*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Ammon, U. 2007.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pen ques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J]. *AILA Review* 20: 123-133.



- Baldauf, R. & B. Jernudd. 1983. Language of publications as a variable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J].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 97-108.
- Baldauf, R. & B. Jernudd. 1987.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example of Scandinavian psychology [J].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98-117.
- Benesch, S. 2001. *Critical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 Burrough-Boenisch, J. 2008. Negotiable accepta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anguage professionals in Europe and NNS scientists wishing to publish in English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7: 31-43.
- Calaresu, E. 2011.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Italian as a language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issue of diglossia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10: 93-108.
- Calvet, L. 2006. *Towards an Ecology of World Languag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nagarajah, S. 2002. *A Geopolitics of Academic Writing*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Casanave, C. & S. Vandrick (eds.). 2003. *Writing for Scholarly Publication: Behind the Scenes in Language Education* [C].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UP.
- Coulmas, F. 2007. *Language Regimes in Transform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erguson, G., C. Perez-Llantada & R. Plo. 2011.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 study of attitudes [J]. *World Englishes* 30: 41-59.
- Gazzola, M. 2012. The 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General trends and cas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16: 131-156.
- Hamel, R. 2006. Spanish in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for a plur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7: 95-125.
- Kloss, H. 1969. *Research Possibilities on Group Bilingualism: A Report* [M]. Quebe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 Lillis, T. & M. Curry. 2010. *Academic Writing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Publishing in English* [M]. London: Routledge.
- Lo Bianco, J. 2010.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In N. Hornberger & S. McKay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43-174.
- Pennycook, A. 2001.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 Phillipson, R. 2010. *Linguistic Imperialism Continued* [M]. London: Routledge.
- Ricento, T. & N. Hornberger. 1996.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 [J]. *TESOL Quarterly* 30: 401-427.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UP.
- 蔡基刚, 2012, 学术英语课程需求分析和教学方法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

- 30-35。
- 陈理斌、武夷山,2011,世界学术期刊出版语言选择现状与趋势[J],《科技管理研究》(1):35-39,43。
- 陈明瑶,201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英语著述出版现状和趋势考察[J],《中国出版》(17):57-59。
- 从 丛、李咏燕,2003,《学术交流英语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党生翠,2005,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以 SSCI 为例[J],《社会科学论坛》(4):62-72。
- 胡 瑾、曾 蕾,2007,国际学术交流英语演讲稿语篇模式分析[J],《外语教学》(3):20-24。
- 黄 萍、赵 冰,2010,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学者国际期刊英语论文发表之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5):44-48。
- 李宇明,2008,提倡开展领域语言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115。
- 李宇明,2011,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J],《南开语言学刊》(1):1-8。
- 李宇明,2013,领域语言规划试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86-92。
- 李照国,2008,《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屈文生,2012,中国法律术语对外翻译的问题与成因反思[J],《中国翻译》(6):68-75。
- 桑 海,2013,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三重境界[N],《人民日报》,2013-6-6。
- 束定芳,2013,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3):426-435。
- 苏长和,2010,假如世界只有英文[N],《东方早报》,2010-10-20。
- 苏长和,2011,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如何可能[N],《文汇报》,2011-8-22。
- 王 宁,2006,对人文社会科学现行学术评价系统的确认和辩护[J],《学术研究》(3):5-9。
- 王 宁,2013,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大有作为[J],《中国外语》(2):1, 11-12。
- 吴玉章,2003,规范学术术语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6-12。
- 谢天振,2005,外国语言文学学位论文:用什么语言写作? [J],《中国外语》(5):43-47。
- 阎光才,2004,话语霸权、强势语言和大学国际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14-20。
- 赵守辉、张东波,2012,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J],《外国语》(4):2-11。
- 赵宴群,2010,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SSCI、A&HCI 期刊发表论文的分析和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1):75-79。
- 朱 剑,2009,学术评价、学术期刊和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5):126-137。

收稿日期:2013—07—11;修改稿,2013—09—22;本刊修订,2013—10—11

通讯地址:200083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沈)

201620 上海市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夏)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the Japanese *daremo*... construction — Compared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p. 842)

JIA Li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YANG Kairong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153-8902, Jap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al distinctions of a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expression with interrogative pronouns referring to peopl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 main point made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Japanese *daremo*...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subject does not exist or events relevant to the given subjects are untenable. In this case, it has a distinctive difference with the Chinese *shei ye*... construction, and can not replace each other. However, it always corresponds to the Chinese *mei ren*... construction. What causes such a difference is that the generic noun *hito* can not be negated directly in Japanese and thus a virtual set needs to be introduced and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need to be used, which leads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syntactical function of the structure *daremo*... construction. Contrastively, the Chinese *mei ren*... construction can fulfill this need of expression and serve this part of syntactical function, and the syntactical function of *shei ye*... is not extended.

**Constructing a model of U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develop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p. 854)

WEN Qiufang & ZHANG Tianw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n initial attempt to construct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U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development by iteratively reading and analyzing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 report and paper. The model we construct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two levels. At the first level, we identify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model and explain their relations; at the second-level, we illustrate the constituents within each component and their relations. The model at the two levels can clearly describe the trajectory through which the US has developed it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t can also well show the measures taken to ensure its effective progress. The paper finally indicates that three outstanding features displayed in the model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it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Functions of language as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viewed from the English Official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S** (p. 865)

CAI Yongli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WANG Kef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With language problem as its focus, the English Officialization Movement initiated in the 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aims to reinforce the already powerful stat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legislation. The movement reflects clearly on the one hand the English-only linguistic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to its nation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and thus a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as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ethnic acculturation.

**Language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approaches** (p. 876)

SHEN Q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XIA T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AC) have emerged as a critical topic in Sociolinguistic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up>st</sup>

• 960 •

century with an increasing depth and scale. China is in an urgent need of looking into language planning for IAC.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on language planning for IAC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ntative multi-level and multi-fiel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language planning to solve issues in this regard.

**The speech-gesture representation of motion event by Chinese advanced English learners** (p. 886)

*LI 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CAO Yu*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eech-gesture representation of motion event by Chinese advanced English learner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1) participants comply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in both their Chinese and English speech production, but the former also show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2) participants' co-speech gestures mostly encode path information, with some encoding manner information due to semantic constraints, kinesiology and cognitive economy principle; 3) participants' gestures are regulated by their speech which also serves as their reinforcement.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unified communicative system for speech and gesture.

**An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nglish spelling errors of Chinese learners** (p. 897)

*DENG Jinl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s of position, word frequency, word length, letter and phoneme in the English spelling errors of Chinese learners with data of editing paths of the spelling errors in CLEC generated with Myers's (1986) algorithm. It discusses three potential factors, i. e. phoneme's distribution in the syllable, the number of possible orth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for a phoneme and the phon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 error rates for different phonemes. The findings are: 1) the reason why vowels' error rate is higher than sonorants' and the sonorants' error rate is higher than obstruents' is probably that vowels are usually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syllables, obstruents the outer positions of syllables and sonorants not only the outer positions but also between vowels and obstruents; 2) the more graphemes a phoneme corresponds to, the higher the spelling error rate of the phoneme; 3) phonemes absent in Chinese phonology usually have a high spelling error rate.

**A study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foreign lexical attrition** (p. 909)

*NI Chua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Word forgett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studied for a hundred years. Research on foreign lexical attrition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past 3 decades. Based on data from 151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ir English lexical attrition by measuring their receptive vocabulary size at different times. The findings are: 1) A clear-cut 3-stage is observed after graduation: 2 years, 6 years and 6 years onward, corresponding to features of "rapid attrition — stable period — rapid attrition"; 2) The attrition process found he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l by Bahrick; 3) Measured in actual size, the graduates are found to retain around 3100, 2900 and 1500 words in the 3 stages respectively.